

两年前，张闻天的外甥马文奇教授与世长辞，我悲痛万分。马老师是我的恩师，他对弘扬张闻天精神所做的一切，他的人格魅力，他的音容笑貌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们有缘”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从不相信唯心的东西。可和马文奇老师的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我不得不相信世上有“缘分”两字，否则一个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怎么能和外文系的老师结成莫逆之交，一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市区人，怎么能在浦东这块人杰地灵的热土上踏到诞生于二十世纪元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张闻天同志的那么多的足迹。怪不得马老师有一次对我说：“我们有缘”。

我和马老师初识于1965年秋，我们一起在龙华镇参加四清运动，马老师是外文系俄文组的，当过苏联政治经济学专家翻译，常同经济系教师合作翻译专著，和经济系有着很深的渊源，后来于1982年正式调入经济系。我们工作组是师生组成的团体，相处十分和谐。

1968年初，毛主席作了“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作为班委成员，我主动挑起了复课的任务，几个人一商量，决定请马老师出山教我们俄语。马老师欣然同意，自编教材，书名为《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故事集）》，这本以复旦大学外文系名义打印的在特殊历史时期使用的特别教材，至今我还珍藏着。

1968年6月，我分配到南汇县瓦屑公社（今属周浦镇）当教师，和马老师的老家不远，马老师托老同学找到我，从此我们之间增加了一层同是浦东人的关系。后来我才知道，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张闻天是马老师的舅舅，张闻天的故居离我工作的地方瓦屑不远，更令我想不到的是，瓦屑竟是张闻天的祖居。1983年至1985年，我担任瓦屑公社志编写组主编，在收集资料和考证的过程中，知悉南汇县惠南镇小学是张闻天的母校，我工作的学校前面的六灶港是张闻天乘船到上海必经之路。我们征集到一部颇有历史价值的家谱即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刻印的《利造桥张氏世谱》。这部家谱在前言中道出了瓦屑这个怪地名的由来，原来此地“明季遭倭寇之乱，庐舍毁于兵火，

恩师马文奇保存张闻天文稿遗物始末

◆ 韩妙法

【作者简介】

韩妙法 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中学高级教师。发表过一些论文和译著。

存者惟瓦砾而已，至今名其地为瓦屑墩者，盖兴宗公旧址也。”后来经我的副主编张志明的考证，兴宗公是张闻天浦东地区的始祖。据传，张闻天的祖辈每逢清明节还要去瓦屑张家祠堂和张家墓地，凭吊祭扫自己的先祖。

在马老师托同学在瓦屑找到我后，鼓励我重拾俄语，手把手地教会我翻译政治经济学著作，合作翻译出版了《经济学基本知识》等译作。更使我感动的是，马老师带领我参加了研究宣传张闻天的行列，我整理过张闻天的笔记文稿，收集过张闻天的生平事迹，又在马老师的指导下，在业余时间写过运用张闻天的观点分析研究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的学术论文。1990年8月30日，《张闻天故居》正式开放时，马老师又赠给我由他舅妈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刘英亲笔签名盖章的纪念张闻天的首日封。

文稿一定保存好

1979年6月，马老师写信给我，要我到他家有要事相商，我从南汇赶到复旦教师宿舍，一进门，马老师就拿出一本杂志给我看，原来是复旦学报1979年第三期，上有《张闻天同志的政治经济观点简介》一文，文章全面而简单地介绍了张闻天的理论，大部分引用自张闻天从未发表的文稿或笔记。这篇文章在当时称其为东风第一枝当之无愧，不光意味着张闻天即将平反昭雪，而且拉开了宣传研究张闻天的帷幕。马老师正是为商讨研究张闻天的经济思想这个目的招我来的，他要求我协助他整理张闻天的书信、笔记和文稿，一起撰写文章。马老师告诉我，他拥有张闻天的文稿和笔记是因为文稿是他保存的，而可以用他的名义发表是因为这是张闻天的嘱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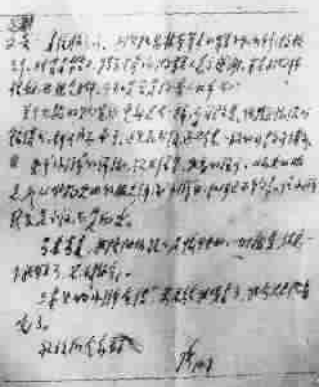
马老师曾两次保存张闻天的文稿。第一次颇为惊险，第二次极为悲壮。由于有点传奇色彩，第一次保存过程，后来成为电视连续剧《张闻天》中一个敲击心扉故事情节，可马老师同我讲得十分平直。1974年8月6日，张闻天写信给马文奇，要他利用暑假到肇庆一晤，他立即动身前往，见到分别八年之久的舅舅。张闻天把这几年在肇庆写的三篇文章交给他，要他誊写，两周只抄了一半左右。由于假期即将到期，他只能要求回校继续抄写。张闻天叮嘱他不能让他们（指“四人帮”之流）发觉，因为其中有他冒着很大风险写下的如《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直接批评“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文稿。因此马老师带文稿回上海的过程有点像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者转送情报那样神秘，他把文稿藏在鲜桂圆之下，躲开警卫员的视线，由张闻天亲自送到轮船码头。到了上海，马老师日夜誊写，并抄两份，分别隐藏于书和稿件中，为了证明是张闻天的文稿，他抽出原稿三处一共6页留下，夹在《毛泽东选集》等书中，其余原稿按照张闻天的叮嘱销毁。

1975年8月，张闻天和刘英经批准迁居无锡，张闻天带病修改肇庆文稿。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一生忠于党的张闻天含冤逝世，“四人帮”下发了“继续保密”的指示。刘英按照张闻天生前的嘱咐，把经研所发还的文稿笔记、卡片和肇庆文稿等，共七八十万字，交给马文奇保存，马老师对刘英说，“只要我人在，文稿一定保存好！”他又开始了夜以继日抄写文稿的工作。

马老师誊写和保存张闻天书信、文稿、笔记和卡片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可他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义无反顾地卫护收藏，特别是在1976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倒施逆行



▲ 1974年8月，马文奇赴广东肇庆抄写文稿，和舅舅张闻天合影



▲ 1975年10月7日，张闻天给马文奇的信

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如果被“四人帮”爪牙探知批判“四人帮”的文稿在马老师那里，那后果真是不可设想，首当其冲的是地毯式抄家，文稿等不管藏在哪里，都不能幸免。于是，当师傅提议请马老师哥哥帮助抄写时，遭到马老师的反对，大有舍我其谁的气魄。后来，马老师总算没有被抄家，张闻天的文稿、笔记等也终于保存了下来。粉碎“四人帮”后，马老师立即把文稿归还给了刘英。自己仅仅留下了复抄的摘录稿。

张闻天平反后，某报记者采访了马文奇，把藏稿的细节进行艺术

【作者简介】

郑文林 1960年3月提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留系任教。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出版有《郑文林学术理论文存》。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首届“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张腾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校长，校党委书记，著名教育家。上世纪50年代末，他被打成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60年代初被平反后，他没有再回校部当领导，而是要求到哲学系工作，为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这期间我和他打过一回交道，谁知以后竟引起了一场风波。

1960年初，我和年级一些同学被通知提前毕业，分在哲学系各教研室当助教。当时哲学系正处于大发展时期，就是这样，教师还是不够，于是从1960年、1961年的本系和外系毕业生中，又留了一二十人分在各教研室当助教。这些新留的助教大都是团员，于是系党总支决定成立哲学系教师团支部，并指定我当团支部书记（当时我已入党）。一次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大家都要求新任系主任张腾霄就入党、业务提高问题来给大家讲一次话。我将大家的要求去和张腾霄讲了，他很痛快

张腾霄一次讲话引起的风波

◆ 郑文林

地应允。他问我讲点什么？我说就两条，一是入党，二是业务如何提高。

这次讲话在1962年的秋天进行。张腾霄首先问了大家的情况和要求，之后他就说了以下这番话：

他说，大家提的问题和要求，就是一个“又红又专”问题。这个问题上有偏向，就是首先讲“红”，忽视“专”；甚至有“红”才能“专”，这是叫你们做一个“空头政治家”。他说，“红”是什么？就是爱国，为人民服务。拿什么去爱国，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本领，有业务，就要有“专”。没有本领，没有业务，没有“专”，光喊“红”，“为人民服务”，都是空的。因此张腾霄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没有“专”就没有“红”。张腾霄这话令我当时吃了一惊，这是过去从没有听到过的。

由此张腾霄讲到了“入党”和“提高业务”的关系。他说，你们要求入党是好的，但要有所表现；怎样表现，主要就是提高业务，苦读书。业务提高了，课讲得好，能写出有见解的论文，甚至著作，你的入党问题就好解决了。你不努力提高业务，拿不出东西，整天浪费时间去读那些政治小册子，你是入不了党的。

接着，张腾霄谈到了我们这些助教的“发展前途”，他说：你们别以为在人大哲学系好混，当了几年助教就自然会升讲师，再当几年讲师就会升副教授，最后会当上教授。不会这样。做了几年助教会提个讲师，这有可能；但再往上当个副教授，就不一定了，你没有研究成果，没有著作，是当不上副教授的；至于当教授，更是难了，没有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当不了教授的。

张腾霄又进一步对我们“加码”：你们如果不努力，就是在助教的岗位上也混不下去。你们都看到了，今年（指1962年）我们在应届毕业生中留了两个人在系里当助教，而从现有助教中淘汰了两人出去；以后每年我们都会这么做，作为我们系里一项长期政策。就是说，你们如果不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去。

张腾霄讲的这番话，对我们这些小助教震动极大，压力极大了。他的这次讲话后来传了出去，在系里青年教师中也引起了震动和压力。

以我来说，当时我已结婚，爱人哥哥在清华大学当老师，每个星期

天，他总要叫我们去玩，可每次晚上回来，当我看到我住的集体宿舍每间屋都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在苦读时，我就有压力 and 自责：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

我不仅自己要努力读书提高业务，在团支部书记的工作上，我也把张腾霄的讲话作为指针，就是一切为了提高业务，给业务让路。当时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助教方立天，正开始学习佛学，每周要去中国佛学院听佛经课，可有时我们要过团组织生活，他就常向我请假，我也一直准他假。还有中哲史教研室另一名助教张立文，非常用功勤奋，还常写论文向报刊投稿，可因为他刚学中哲史不久，水平不到位，因此常被退稿。他所在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为此说他有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找到我说，要我教师们团支部开会批评帮助他。我想，想写文章发表，提高业务，不正是张腾霄要求的吗，怎么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呢？我就压下没有开，也没有告诉张立文。以后几十年，我们这个哲学系教师团支部出了不少人才，像上面提到的方立天、张立文，还有后来的方

加工，说把文稿包好藏在花盆泥土底下等。“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我只把文稿笔记夹在自己的稿纸或书籍中间，然后分处隐藏。”马老师对我说，后来我亲见的一件事证实了马老师这个说法。有一次，马老师在书架里找他过去的译作赠送给我，取出一本随手翻了翻，突然一页信纸飘落在地上，他捡起一看如获珍宝地叫了一声，原来是张闻天写给马文奇的信，时间约在1952年左右，当时马老师在上海外语学院读书，信的内容大致是叮嘱外甥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为祖国贡献力量等语，字里行间充满了殷切期望和浓浓亲情。

肇庆文稿

张闻天在肇庆写的文章，后来统称为肇庆文稿。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张闻天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张闻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全文，在文前“编者按”中指出，此文“除了使人感到它的理论力量和教育意义以外，还使人亲切地感到一位忠贞刚毅的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凛然正气。”2天后的8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马老师从肇庆带回上海誊写的《党的斗争要正确进行》一文，此文矛头直指“四人帮”陷害、打倒革命同志的罪恶行径，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1979年9月，这两篇文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成单印本出版，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成为张闻天平反后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在2011年出版的《政坛风云》一书中对肇庆文稿的评价是“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正确的理论思想的最高水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的《张闻天图册》写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在1979年《人民日报》首次发表时，为全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中共中央批准的1995年出齐的四卷本《张闻天文集》后记中这样写道：“张闻天夫人刘英、外甥马文奇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保存张闻天的文稿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克立、郑抗生等等，现在都成了中国哲学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我想，这和张腾霄的这次讲话精神影响不无关系。

可是不久以后，随着对“重提阶级斗争”的贯彻和发展，张腾霄这次讲话就成为问题并被当成一个“事件”来抓了。

1964年春天，哲学系新任党总支书记把我从“十八所”（1963年我被上面抽调到这里参加当时的“反修”理论工作）专门叫回学校，向我详细调查了解张腾霄这次讲话的情况，还问我有没有记录？我说有，是记在本上的，他叫我拿给他看。我找出给了他。后来听说，系里还专门为此开了批判会，张腾霄就他的这种“白专道路”作过几次检查。

以后我被调入新成立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大学又来人找我外调，还是张腾霄的这次讲话。我如实讲了有关过程和讲话内容。他们说，张腾霄的“问题”非常严重，他在哲学系搞“白专道路”，他的这个讲话，在全国都够得上是个“典型”。

几十年后的现在来看，张腾霄的这次讲话和他在哲学系一系列办系思想和措施，在全国是够“典型”的——不过是正面的典型。在当时那种情势下，他能说出这番话，出台这些措施，表现了他求真务实的教育思想和气魄，是非常不容易的。